

※ 日本學者論群經注疏專輯 ※

越刊八行本注疏考

長澤規矩也著 蕭志強譯*

在宋刊注疏本中，有八行大字本。此稱為「越刊八行本」或「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俗稱「三山黃唐本」，近藤正齋則稱之為「浙江官書刻本」（《正齋書籍考》卷一）。之所以稱之為三山黃唐本，乃因此本中最有名的《禮記正義》之末，有紹熙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之跋。跋云：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章刻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鐫諸本。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

此跋文如前人所屢引用的，主要在闡明越刊八行本注疏刊刻始末。亦即，《詩》、《禮》二經的注疏在紹熙二年（辛亥）黃唐提舉兩浙東路時，就已打算加以刊刻。至於刊刻的年代，跋中提到了《易》、《書》與《周禮》三經刊年，確實是在紹熙以前，但精確年代則未可知。

以上三經之中，傳至今天的有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所藏的《易經》。雖沒有序跋，但相當接近初印本。另外，《瞿目》、《瞿影》著錄本有後印本。這本《易經》的闕筆只有「構」字，「慎」字則不缺。在《書經》方面，有松崎謙堂的覆刻本，為世人所知。其原本同樣藏於足利圖書館。此本「構」字同樣欠缺，但在明朝有全葉以及一部分的補刻。相傳李盛鐸遺愛的一部分有補刻，但尚未得見。《周禮》方面，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明修五十卷三十二冊，皆有刻工姓名，以之與刊年明確的《禮記》刻工相比，雖無法視為四部全書相關作品，其中《周禮》疏本人

* 蕭志強，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

過去曾見過，只可惜當時並沒有細查刻工，所以，除了書影及加藤虎之亮氏所藏明修零本之外，若必須進一步考證，只能參考足利《禮記》本。但足利《禮記》本比影印及覆刻的潘明訓氏藏本還早，且有補修之處，是為遺憾之處。然而比較的結果卻發現，《周易》與《禮記》之間不可思議的，如下表所示，並沒有任何共同的刻工。

《易》與《書》：丁璋、毛昌、王玘、朱明、孫中、徐亮、徐茂、梁文

《書》與《禮》：方堅、毛祖、毛端、王恭、朱渙、徐仁、馬松、高文、張昇、張謙、楊昌、楊潤、劉昭

在此，《書》與《禮》都屬於補修本，打△的地方代表仍有疑問，但大體上這些刻工不只不是元朝補修當時的刻工，時間點應該也不會在南朝中葉之後。

《周禮》原刻葉的刻工「朱明」、「徐亮」，只有在《易》與《書》中得見，「方中吳」則出現在《易》之中，「李寔」、「徐顏」、「劉仁」則出現在《書》之中。這些多少值得參考，而若只比較以上刻工，則三經如黃唐跋所述，乃是較早產品，而且其中的《尚書》，可看出應該是最後完成的。

此外，若進一步將《周易》刻工與八行本以外作品比較，則與一般被認為是孝宗時代刊本《廣韻》（靜）共通的刻工有七人（丁珪、王玘、徐茂、梁濟、許明、陳錫、顧忠），與被認為與光宗時代刊本的《論衡》（圖）一致的有四人（毛昌、王玘、梁濟、陳明）等等。由此可見，此《周易》之刊刻並非舊說之紹興，而應該是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刊本。也因此，《周禮》之刊刻應該在此前後。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紹興刊本。不過，《周禮》在一開頭題為「周禮疏」，以小字刻有賈公彥之序。這雖然是承襲注疏合刻以前的單疏本形式，但河又正司氏將注疏配合的次第及每行字數與其他八行本相比，發現有明顯的不統一之處，因而認為注疏合刻本之中，這應該是最早被編刊的（《東洋文化》第一〇七號，〈注疏分合的問題〉）。河又氏的意見頗值得參考，並且河又氏指出，本書之刻工據說與《尚書正義》幾乎一致，更足以否定紹興之說。不過，若根據刻工而進行考證，則現存之諸本（北平圖書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大連圖書館、加藤虎之亮宅，加上舊內閣大庫舊藏所收的殘零本），都是明修本，而初印本有可能早在宋代就出現補修本。此外，朱氏結一廬書目之中，有所謂「《周禮注疏》五十卷三十六册宋慶元間沈中賓刊」，其中提到了下揭根據《左傳》的誤解。

如黃唐之跋所見，並不知有與《禮記》前後而被刊刻的《毛詩》傳本。《留真

譜》著錄多福文庫舊藏本則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曾經一見，但為森《志》著錄的舊鈔零本。

至於黃氏力不足而未出版的《左傳》，慶元中由吳興沈中賓加以編刊，《校勘記》中著錄有「宋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宋慶元間吳興沈中賓所刊」。此書在竹汀先生《日記抄》卷一中也可見，同樣在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春秋正義》宋槧本」條中，也有以下記載：

吳門朱文游家藏宋槧《春秋正義》三十六卷。云宋淳化元年本。實則慶元六年重刊本也。每葉前後各八行。行十六字。卷末有馮嗣祖、趙彥謙等校勘字。今通行本哀公卷首正義全闕。獨此本有之。文游嘗許予借校。會予北上未果。今文游久逝。此書不知轉徙何氏矣。

這部分是淳化刊本的重刻，可視為單疏本，但如果從八行十六字的行款看，應該是注疏之合刻本，此本未聞有今傳本。（著者上欄有「涵芬樓藏」的字樣。）〔編者補記，北京圖書館現藏〕

至於頗受近人重視的八行本，其中有《論語》與《孟子》。這兩部作品在《舊京書影》中都有保存，其中《孟子》又見藏於《故宮善本書影》初編中，也著錄在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種之中。根據故宮書影的目錄，該本乃是明修本，題為《孟子注疏解經》，有大字的孫序。同影刻工雖不鮮明，但根據袁寒雲的提要，只有卷三、四的殘本，內容則是八行、十六字、注疏雙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缺筆還有「擴」字，除了附記「宋刊宋印」之外，還有附記卷中之刻工。這部分應可作為刊年考證之用。而如果將這部分和其他八行本比較，可以發現與《禮》一致的有七人（毛俊、宋瑜、李信、徐仁、許貴、許詠、楊昌）之多，與《書》一致的有三人（丁之才、徐仁、顧祐）。八行本以外，與宋刊元修本朝《文鑑》之宋刻部分一致的，也有三人（李彥、沈思忠、徐仁）。因此不得不令人懷疑，本作品乃是距離紹熙不久的刊本。然而，如果如上述有「擴」字闕筆，則除了「當代天子之御名亦有闕筆」之外，有可能也是因為寶慶之後三十餘年之間都只有這六、七刻工繼續從業（第一種看法），或者是袁氏著錄本的《孟子》乃寧宗朝刊理宗朝修本（第二種看法）。相反的，如果我們將重點放在《禮記》有補刻這件事上，則與《孟子》刻工一致的《禮記》紙葉，就可視為補刻部分，而將《孟子》視為理宗朝之刊本（第三種看法）。然而，所謂「諱當代天子之名而闕刻」的說法，個人覺得難以接受。特別是接近慶元之際的當時，更不至於出現這種情況（此事請參照別章

〈宋版形態上的特徵〉)。故在前述三種看法之中，第一種看法，也就是同樣的好幾個刻工竟一起從業三十餘年，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於第三種看法，從足利學校藏本中該七人刊刻之紙葉，後來在潘氏藏本中許多被補刻的狀況看，顯然第三種看法遜於第二種。然而，如果沒辦法得到《孟子》初印本，這個問題還是難以解決。因此，我們必須先找到寧宗初年的原刻。《論語》根據《舊京書影》，題為《論語註疏解經》，款式類似《孟子》，而《書影》第一一九的刻工，似乎可看出是《孟子》中出現的宋瑜。若然，則應該是與《孟子》前後的刊本。至於是官刻本或私刻本，則不明。而若回顧越刊注疏本刊行者，則根據黃唐之跋，乃是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黃唐當初如果只刊刻《詩》與《禮》二種，這本書就不應當說是黃唐本。至於所謂浙江官書刻本的說法，則未免太籠統。岳珂的《九經三傳沿革例》的「書本」之條中，將此稱為越中舊本註疏。王國維則在〈禮記正義跋〉中稱之為越州本，至於〈兩浙古刊本考〉卷下，則在紹興府刊板的條項中舉出浙東轉運司本的《易》、《書》、《詩》、《周禮》、《禮記》，而將《論》、《孟》視為慶元之後的刊本，故簡稱為越刊本。再加上八行之行數，合稱為越刊八行本。這是最簡便的方法。而且，不由官資刊刻的《論》、《孟》採取如此名稱，也較暢通無礙。

其次，八行本的價值也值得討論，特別是針對《易》的討論，早在《瞿目》之中就已有詳細記載。並且針對未見的《左傳》，上揭錢氏文，也有明顯提及。至於針對《易》、《書》與《禮》，則《七經孟子考文》中有討論，在此不再說明。

八行本的板本在後世被保存下來，經過屢次修補印行，這些過程上文已有清楚討論。總之，根據足利之《書》與《禮》，可見早在宋代已有補刻。而《書》方面，也證明曾進行過數行補修（比如卷四第六葉）。亦即，這些著作應該是每發現有壞掉就隨補隨印。足利的《尚書》刻工上，出現有「何建」、「何慶」、「周鼎」、「鄭堃」等人姓名，和元延祐中，饒州路學刊本《文獻通考》的刻工一致，由此可見，同書乃是元修本。此外，更有趣的是，《禮記》方面，根據常盤井賢十氏的調查（《東方學報》（京都）第四冊，〈宋紹熙板禮記正義に就いて〉），潘氏藏本的補刻紙葉刻工，與宋刊元修本《宋文鑑》相同的有七人（王全、王壽三、胡昶、章文、楊采、趙遇春、鄭堃），與《漢書》相同的有六人（王文、王全、沈昇、章文、德潤、鄭堃），與《陳書》相同的有五人（毛文、王全、胡昶、章文、詹德潤），與《說文解字》以及《南齊書》相同的，各有四人（略）。由此可見，潘氏所藏的《禮記》，顯然就是元修本。也因此，八行本應該是在元時期被補刻的。

八行本的板木後來留傳到明朝南監，而正如王國維的考證，《南雍志經籍考》中也可看到一部分。上述故宮博物院的《周禮》、《孟子》及舊內閣大庫收藏的佚出《周禮》與《禮記》，都是南監印本，特別是後者之一的《禮記》零本（卷六十五），其中可找得到明朝中葉以降的補刻（《十三經注疏影譜》所收）。

總之，越刊八行本注疏若以現存本為討論基礎，則原本應是兩浙東路鹽司所刊，乾道、淳熙年間首先刊行《易》與《周禮》，接著刊行《尚書》，到了紹熙年間再刊行《禮》與《詩》。最後慶元年間，沈中賓刊刻《左傳》，而於此時間前後，不知是由政府還是民間出資，《論》、《孟》也上梓了，且歷經宋元明三朝，都持續有補修與印行。

王國維在《禮記正義》中寫了跋文，認為十三經幾乎都已經具備。但照我的看法，二《傳》（按理說應該是《穀梁》的單疏本，但現存不明）及《爾雅》因為與實用距離太遠，沒有受到重視，因而並不甚流行，也因此沒有刊刻，只停留於單疏本補修與印行的階段。至於《孝經》則因為是薄冊，而且沒有傳本，所以還沒有人認為這部分必須加以刊行。

附 記

本篇乃根據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所藏之八行本刻工細查及加藤虎之亮博士的博士論文加以補訂而成。

——譯自《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1卷（東京：汲古書院，1982年8月），頁26-31。